

【主持人语】本期专题为：“非洲国别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研究”。

非洲是语言种类最多、语言状况最复杂、语言政策最多样的大洲。非洲的语言资源之丰富，使其成为语言研究的富矿。非洲人口接近 14 亿，约占世界总人口的七分之一，但非洲的语言大约有 2000 种，占世界语言总数的三分之一。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报告，语言多样性指数最高的前 20 个国家和地区中有 15 个在非洲，其中坦桑尼亚、中非、乍得等国语言多样性显著。事实上，非洲绝大多数国家都具有语言多样性特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非洲国家逐渐摆脱原宗主国的统治，宣布政治独立。此时，语言问题变得尤为突出，成为新兴国家的重要政治议程之一。但语言问题不仅仅关乎语言本身，更多的是与社会现实紧密相连。在这样的背景下，语言规划的作用凸显，其目的主要就是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语言问题，自然也包括非洲国家在内。

非洲种族、部族众多，加之历史传统和殖民的原因，语言使用状况极其复杂。非洲的语言、民族、文化、宗教、经济、社会变迁等问题往往交织于一体，很难清晰洞察问题的实质所在，或做出明确的归因分析。这一方面成为非洲研究的难题，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其研究的吸引力，因为复杂问题的研究，往往成为学术研究创新的突破口。中非合作论坛、“一带一路”倡议和“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使得中非合作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遇。在此时代背景下，重视非洲国家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顺应时代潮流和发展大势，对加强中非关系，促进中非政策沟通、语言互通、民心相通大有裨益。本期专栏 4 篇文章聚焦非洲国家语言政策与规划的变革及其现实问题。《赞比亚语言教育政策变革及其对中文教育发展的启示》发现，当代赞比亚语言教育政策在英语霸权与象征性多语主义之间寻求平衡，既受制于殖民治理的路径依赖，又通过“英语核心+本土语言辅助+外语选修”的三层体系回应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需求。《卢旺达语言政策演进的核心逻辑：从去殖民化到国家发展》的研究表明，卢旺达语言政策历经多次变化，呈现出包容性、开放性和发展性等鲜明特征。当代卢旺达语言政策演变的核心逻辑是从去殖民化到最终实现国家的全面发展。《乌干达“双核心、多辅助”语言规划解析》认为英语占据主导地位与本土语言边缘化之间形成了结构性矛盾，这印证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去殖民化语言规划”所面临的深层困境。《基于驱动过程理论的失败语言规划分析：以阿尔及利亚为例》则揭示出阿尔及利亚独立后推行的以现代标准阿拉伯语为核心的语言规划，因政府对民众语言态度引导失效、规划主体动机冲突、政策实施策略与指标脱离实际等问题陷入困境。上述 4 篇文章各有侧重，反映了非洲国家语言政策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也表明，非洲大陆语言政策有广阔的研究空间，值得深入探讨。

(王辉，男，浙江师范大学杰出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院长，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研究方向为语言政策与语言传播、国际中文教育等。)

赞比亚语言教育政策变革及其对中文教育发展的启示^{*}

卢思羽，徐丽华

(浙江师范大学 国际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摘 要】赞比亚语言教育政策经历了从殖民时期到独立后的历史演变，呈现出制度惯性下的被动调适、语言功能的价值重构及全球化驱动下的战略布局等特征。当代赞比亚语言教育政策在英语霸权与象征性多语主义之间寻求平衡，既受制于殖民治理的路径依赖，又通过“英语核心+本土语言辅助+外语选修”的 3 层体系回应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需求。作为其官方外语教育之一，中文在赞比亚的发展需从工具属性、战略属性、融合属性 3 个维度考量，以期促进中文深度融入赞比亚国民教育体系及中非语言文化交流。

【关键词】赞比亚；中文教育；工具属性；战略属性；融合属性

【中图分类号】H0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2025)04-0029-09

DOI: 10.14091/j.cnki.kmxyxb.2025.04.004

^{*} 【作者简介】卢思羽，女，黑龙江牡丹江人，浙江师范大学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非洲中文教育、语言政策等；徐丽华，女，浙江金华人，浙江师范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为非洲中文教育、语言政策等。

【基金项目】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国际中文教育研究课题“中文纳入赞比亚国民教育体系的成效及优化路径研究”(23YH19D)；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非洲语言政策与规划发展变革研究”(17BYY013)；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非洲百年汉语传播研究”(21&ZD311)。

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语言作为国际传播的重要媒介,是文明互鉴的桥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的建设离不开对语言的重视,而通过语言推广提升国际影响力已成为有政治经济实力的大国竞相采取的国家战略。^①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国际中文教育加速走向全球。然而,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深刻演变,如何实现中文教育有效、持续且深入地发展,已成为亟待破解的课题。语言传播通常以教育为根基,而一国的语言政策与其社会发展、政治态度、国家安全等方面息息相关。对于国际中文教育而言,对象国整体的语言政策框架,尤其是语言教育政策,构成了最直接、最关键的发展环境。

正如张西平指出,“中文教育‘走出去’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所在国的外语政策是什么。如果对对方的外语政策一无所知,便难以制定切实可行的汉语推广政策”^②。因此,深入研究和精准把握对象国的语言政策,尤其是语言教育政策的定位、目标,不仅是推动国际中文教育本土化落地的必要前提,更是践行“深化文明交流互鉴”要求的实践路径。

赞比亚作为非洲中南部的重要国家,1964 年独立后立即与中国建交,是南部非洲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独立至今,赞比亚一直与我国联系紧密,是我国对非战略发展的重要国家之一。赞比亚全国共有 73 个民族,2057 万人口。^③ 由于民族众多,再加上殖民历史、政治架构以及地缘关系的影响,赞比亚社会语言生活极其复杂。从殖民时期到独立时期,赞比亚语言教育政策始终处于变化之中。因此,厘清赞比亚语言状况与语言教育政策发展的脉络与特点,一方面有助于把握该国语言国情,为中赞人文、经贸等领域的交往提供语言层面的支撑,另一方面也可以更好地了解当地的语言教育状况,拓展对中文教育在赞比亚发展空间和机遇的认知。

当前国内对赞比亚的研究多聚焦于经贸、矿产等领域,从语言教育政策视角切入中文教育的探讨仍显不足。基于此,本文拟通过梳理赞比亚语言状况,探究其语言教育政策的变革轨迹及特点,分析其对中文教育发展的启示,以期推动中文深度融入赞比亚语言教育体系及社会发展进程,推动中赞语言交流与合作。

二、赞比亚语言政策及语言状况

19 世纪末,赞比亚(时称北罗得西亚)被英国南非公司(British South Africa Company)控制。20 世纪初由英国政府接管,沦为英国殖民地。20 世纪中期,赞比亚爆发民族独立运动,并于 1964 年宣告独立,但仍保留英联邦成员国身份,与英国保持着传统关系。

(一) 官方语言和国语

新兴多民族的独立国家往往内部语言分歧较大,又没有统一的民族语言。官方语言选择涉及身份认同、政治稳定以及民族团结等诸多问题。因此,为了维护国家稳定、防止民族矛盾,赞比亚独立后延续了殖民期间英语作为官方语言的政策,并以 1991 年宪法第 1 条第 3 款正式明确英语官方语言的地位。^④

除此之外,赞比亚又指定了本土语言中的 7 种作为区域性通用语言(regional lingua francas),即本巴语(Bemba)、尼扬贾语(Nyanja)、汤加语(Tonga)、洛齐语(Lozi)、隆达语(Lunda)、卢瓦莱语(Luvala)和卡翁德语(Kaonde),^⑤ 并赋予了近似于官方语言的地位。^⑥ 2016 年宪法提出允许英语以外的其他语言用作

① 刘洪东. 法语国际传播政策与实践研究 [D]. 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22.

② 张西平. 汉语国际推广中的两个重要问题 [J]. 长江学术, 2008, (1): 127-129.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赞比亚国家概况 [EB/OL]. [2024-05]. 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tz_677316/1206_678698/1206x0_678700/.

④ The Constitution of Zambia (No. 1 of 1991) [Z]. Republic of Zambia Government Gazette, Supplement, 1991.

⑤ Nkolola-Wakumelo, M. A Critical Analysis of Zambia's Language-in-Education Policy: Challenges and lessons learned [A]. In H. McIlwraith (Ed.), Multilingual Education in Africa: Lessons from the Juba Language-in-Education Conference [M]. London: British Council. 2012: 127-145.

⑥ Kula, N. Zambia: Language Situation [A]. The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Second Edition [M]. Boston, MA: Elsevier, 2006. 政府颁布的部分文件中称其为 7 种官方语言, 如 1977 年赞比亚颁布的《教育改革: 提案和建议》使用 seven official languages.

教育机构的教学媒介或用于规定的立法、行政或司法目的。^① 这里的“其他语言”主要指上述 7 种语言, 它们不仅是赞比亚各省份的通用语, 也被广泛用于学校教学、广播媒体、扫盲运动以及政府官方信息发布等。

关于国语的选择, 赞比亚宪法及其他法律法规并未明确提及, 但赞比亚学者通常将这 7 种本土语言视为“七种国语”。^②

(二) 民族语言

赞比亚多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使得其语言难以精确统计, 这也是非洲国家的普遍问题。目前, 学界对其语言数量的判断差异较大, 多数赞比亚学者认为其语言种类介于 30 ~ 80 种之间。这一争议主要源于以下两点, 第一是语言与语言变体区分困难, 部分本土语言有较高的互通性, 常被归为方言变体, 但又因使用差异, 也会被视为独立语言。^③ 因此, 不能以方言数量确定语言种数; 第二是语言与族群的对应关系复杂, 语言和部落、族群之间并非一一对应关系, 同一部落可能使用多种语言, 不同部落也可能共享同一语言, 因此也不能简单地以部落或族群数量确定语言数量。^④ 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赞比亚本土语言的统计很难有确切数字。

《赞比亚 2010 国家人口普查分析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统计显示, 全国共有 73 种方言 (dialects), 其中使用人口 0.5% 以上的共计 24 种 (含英语)。^⑤ 按使用人口比例排序, 本巴语 (Bemba, 33.5%)、尼扬贾语 (Nyanja, 14.8%)、汤加语 (Tonga, 11.4%) 是目前赞比亚使用最广泛的 3 种本土语言。(详见表 1)

表 1 赞比亚主要语言种类及使用该语言人口占比

序号	语言种类	占全国人口百分比	序号	语言种类	占全国人口百分比
1	本巴语	33.5	14	曼布韦语 (Mambwe)	1.3
2	尼扬贾语	14.8	15	伦杰语 (Lenje)	1.2
3	汤加语	11.4	16	纳木旺噶语 (Namwanga)	1.2
4	洛齐语	5.5	17	比萨语 (Bisa)	1
5	切瓦语	4.5	18	乌什语 (Ushi)	0.9
6	尼森加语	3	19	伊拉语 (Ila)	0.7
7	通布卡语	2.6	20	姆班达语 (Mbunda)	0.7
8	隆达语	1.9	21	恩古尼语 (Ngoni)	0.7
9	卡翁德语	1.9	22	森加语 (Senga)	0.7
10	拉拉语 (Lala)	1.8	23	伦古语 (Lungu)	0.6
11	兰巴语 (Lamba)	1.8	24	托卡利亚语 (Toka-Leya)	0.5
12	英语	1.7	25	其他语言	4.7
13	卢瓦莱语	1.5			

注: 占全国总人口不到 0.5% 的语言被归入“其他语言”类别

数据来源: 《赞比亚 2010 人口和住房普查全国分析报告》

① The Constitution of Zambia (No. 2 of 2016) [Z]. Republic of Zambia Government Gazette, Supplement, 2016.

② Marten, L., & Kula, N. C. Zambia: One Zambia, one nation, many languages [A]. Language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Africa [M]. 2008: 291-313. 不同学者对 7 种官方本土语言有不同叫法比如: “the seven official Zambian languages” “seven official vernacular languages” “national languages” 等。

③ 例如: Mambwe 语, Lungu 语, Namwanga 语, Wina 语和 Tambo 语之间可以互相理解; Nyanja 语和 Chewa 语属于极其相似的语言, 区别是 Nyanja 语比较口语, Chewa 语比较标准和正式。

④ Marten, L., & Kula, N. C. Zambia: One Zambia, one nation, many languages [A]. Language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Africa [M]. 2008: 291-313.

⑤ ZAMBIA 2010 CENSUS OF POPULATION AND HOUSING NATIONAL ANALYTICAL REPORT [R]. Published by Central Statistical Office Nationalist Road P. O. Box 31908, 2010.

三、赞比亚语言教育政策的历时演进

语言教育政策是教育领域针对语言作为教学语言与学习科目进行管理的各项措施。对赞比亚而言,其语言教育政策从殖民时期确立,至独立后持续变革,既反映出多语言生态的复杂状况,也体现出权力结构调整与文化认同构建的深层次博弈。20 世纪以来,随着民族国家建构进程的推进,语言在教育领域中的冲突逐渐成为政治控制的深层斗争。^① 殖民政府通过语言规范实施文化控制,独立后新政府则借由语言教育政策重塑国族认同。本节重点关注赞比亚殖民时期与独立时期两个阶段语言教育政策的演变过程,旨在揭示政策变化背后的特征与逻辑。

(一) 殖民时期

殖民初期的语言教育主要由宗教主导。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欧洲传教士建立的教育体系以语言为福音传播媒介,通过 1500 余所教会学校^②推行英语、法语等殖民语言教学。这种通过语言进行传教的模式实质上是文化殖民的初级形态。

1924 年,殖民政府接管教育体系后,语言教育政策转向制度化管控。殖民当局设立教育咨询委员会,确立英语的官方语言地位,同时选取本巴语等 4 种本土语言作为地区官方语言,^③ 形成“分而治之”的语言治理策略。1930 年殖民政府推行“阶梯式双语政策”,即 1~4 年级使用本土语言作为教学语言,4 年级开设英语科目,5 年级以后使用英语作为教学语言。^④ 该政策在 1950 年调整为三阶段的语言过渡模式,在教学语言上,1~2 年级可以使用学生的母语,3~5 年级可以使用主要的本土语言,5 年级以后只可以使用英语。同时,5 年级以后,英语也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开展教学。^⑤

这种差异化的语言教育政策催生了殖民地的语言层级体系,掌握英语的精英阶层占据行政要职,通晓优势本土语言的群体形成中间阶层,仅掌握地方语言者被边缘化。语言等级制与殖民统治结构形成同构关系,为独立后的语言矛盾埋下伏笔。

(二) 独立时期

1966 年赞比亚颁布《教育法案》(Education Act),确立英语为全阶段唯一教学语言,^⑥ 试图通过语言同质化建构国家认同。但该政策导致教学成效不佳。1976 年,赞比亚发布《教育促进发展:教育改革声明草案》(EDUCATION FOR DEVELOPMENT: Draft Statement on Educational Reform),首次质疑单语政策,建议恢复殖民时期不同学习阶段采用不同教学语言的政策。^⑦ 尽管 1977 年最终出台的政策否定了这一提议,选择仍维持英语主导地位,但允许教师使用 7 种官方语言辅助教学。^⑧

1991 年多党制开始,语言教育政策进入了新的调整阶段。1996 年《教育我们的未来:国家教育政

① 詹姆斯·托尔夫森. 语言教育政策: 关键问题 [M]. 俞玮奇,译.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4.

② Kashoki, M. E., & Ohannessian, S. Language in Zambia [M]. London: International Africa Institute, 1978: 461.

③ Northern Rhodesia Government. NORTHERN RHODESIA ANNUAL REPORT [R]. PRINTED AND PUBLISHED BY HIS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1927.

④ Linehan S. Language of Instruction and the Quality of Basic Education in Zambia [R]. Paper Commissioned for Education for all Global Monitoring Report, 2005.

⑤ Manchishi P C. The Status of Indigenous Languages in Institutions of Learning in Zambia.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C]. African Symposium; An On-Line African an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2004, (1). 转引自 Banda F, Mwanza D S. Language-in-education policy and linguistic diversity in Zambia; An alternative explanation to low reading levels among primary school pupils [J]. Selected readings in education, 2017: 109-132.

⑥ Ministry of Education, Education Act: National Policy on Education [R]. Lusaka: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Zambia Printer. 1966.

⑦ Chishiba, Gerald & Manchishi, Peter. The Language Strategy in the Zambian Educational System from 1924 to 2014 [Z].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2016, (4): 2334-2358.

⑧ Ministry of Education. Educational Reform: Proposals and Recommendations [R]. Lusaka: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Zambia Printer, 1977.

策》(Educating our Future: National Policy on Education)承认英语单语政策的失败,允许1~4年级采用适合的语言开展识字教育,但仍维持英语作为官方教学语言的地位。^①1999年全民教育评估进一步推动本土语言教材开发,选定4种优势本土语言编制教学资源,^②旨在提升低年级学生的学习成效。这些调整虽未动摇英语核心地位,但为多语教育开辟了政策空间。

21世纪后,政策调整逐渐呈现重视本土语言发展的改进态势。2011年《教育法案2011》(Education Act 2011)在法律层面确立英语的绝对地位,同时授权部长可在与教育委员会或管理委员会协商后确定低年级基础班识字和算术课程的教学语言。^③2013年双重框架的出台形成特色双语模式:《国家扫盲框架2013》(National Literacy Framework 2013)建议1~2年级除英语科目外的其他科目均采用本土语言作为教学语言,3~4年级采用地方语言教授赞比亚语言科目和读写知识,对于英语语言和英语读写知识则用英语教授;5~7年级,除赞比亚语言科目采用地方语言教学外,其他均采用英语作为教学语言。^④《赞比亚教育课程框架2013》(ZAMBIA Education Curriculum Framework 2013)提出,所有学习领域的1~4年级应采用学习者熟悉的语言作为教学语言,5年级以上英语作为官方教学语言,并明确了赞比亚三大外语语种,即法语、中文、葡萄牙语。^⑤这些政策试图在全球化与本土化间寻求平衡,但在周期性国家课程审查中仍显示,政策未能达到预期效果。

2023年,《赞比亚教育课程框架2023》(2023 ZAMBIA EDUCATION CURRICULUM FRAMEWORK)在教学语言、语言科目上呈现3个转向:一是将英语和本土语言课程学习提前至学前教育阶段,本土语言和外语课程合并作为中学阶段的语言选修课程;二是确立英语作为从幼儿教育到高等教育全阶段教学官方语言,但放宽赞比亚语言辅助教学的功能,规定除赞比亚语言课程和外语课程外的其他科目,使用英语作为教学官方语言的同时,均可使用赞比亚语言作为辅助,用以解释概念;三是将斯瓦希里语纳入外语选项以强化区域认同。^⑥这种调整构建了“英语主导+本土语言辅助+外语选修”的3层体系,虽延续英语核心地位,但通过有限的多语策略缓解语言权利的争议,折射出后殖民国家语言治理的复杂性。

四、赞比亚语言教育政策演变特征

赞比亚作为非洲多语国家的典型代表,在殖民统治遗留下的制度影响、国族认同的政治诉求以及全球化压力共同交织的作用下,语言教育政策的变迁形成了维持英语霸权与象征性多语政策间的动态平衡。

(一) 制度惯性下的政策被动调适

首先,赞比亚语言教育政策的不断调整始终受殖民统治时期制度治理的惯性限制。1930年殖民政府采用阶梯式双语政策,通过语言分化形成了英语主导的教育体系。此后,赞比亚语言教育政策历经近20次调整,始终未突破“英语为主+本土语言为辅”的殖民语言教育架构。尽管独立后,英语作为教学语言的政策频繁暴露出弊端,教育部门强推英语教学导致学生成绩不理想,并由此引发了围绕本土语言兴起的诸多提议及改革。但受限于政治、经济等诸多原因,英语霸权地位并未受到削弱,反而通过法律支持不断得到强化。赞比亚语言教育政策的反复修订本质上是殖民语言秩序的延续,而非实质性改革。新政府一方面试图通过统一语言来加强国族认同感,另一方面却又深陷新殖民主义依赖的悖论。

其次,政策修订主要呈现被动应对的路径依赖。其修订逻辑受具体产生的教育问题的倒逼,而非前

① Ministry of Education. Educating our Future: National Policy on Education [R]. Lusaka: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Zambia Printer, 1996.

② Lungwangwa, Geoffrey Silanda, Emanuel. EDUCATION FOR ALL 2000 ASSESSMENT (ZAMBIA) [R]. Lusaka: Ministry of Education, 1999.

③ THE EDUCATION ACT [M]. Lusaka: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Zambia Printer, 2011.

④ National Literacy Framework 2013 [M]. Prepared and Published by the Curriculum Development Centre, 2013.

⑤ ZAMBIA Education Curriculum Framework 2013 [M]. Prepared and Published by the Curriculum Development Centre, 2013.

⑥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23 ZAMBIA EDUCATION CURRICULUM FRAMEWORK [M]. Prepared and Published by the Curriculum Development Centre, 2023.

瞻性的系统规划。政策修订更多关注教学语言和语言科目的局部危机,忽视语言生态的整体性和系统性。例如,基础教育阶段教学语言转换不顺畅导致学生学习效果不理想,仅有 3% 的学生能够达到理想的阅读水平,^① 使用英语教学导致学生成绩偏低等问题频发。但是,政府和教育部门多次进行政策修订也只是试图解决表面问题,并未触及殖民时期确立的语言等级框架,即英语独占在教育领域的核心地位,这种路径依赖使政策始终在边际调整。即使政策修订基于调研的实证数据,但执行过程常因资源分配、师资短缺、教材标准化缺失等现实制约,使政策变成对教育失败的被动补救措施,无法从根本上提升教育成效。政策制定者也倾向于在既有框架内小幅调整,避免挑战英语主导地位的深层结构。

(二) 功能层级化的语言价值重构

第一,英语工具性持续强化。从殖民统治到独立统一再到全球化到来,英语的主导地位非但未因政权更迭而削弱,反而通过持续的战略赋权获得合法性强化。殖民政府确立英语在行政、教育等领域的核心地位,有意识地构建“英语”与“精英阶层”之间的绑定关系,通过语言层级化策略,将英语塑造为殖民统治与精英阶层准入的工具。新生独立政权延续并深化该模式,确立英语为唯一教学语言,将其“去族群化”的中立属性重塑为超民族国家纽带。这一选择一定程度上规避了激进语言本土化引发的民族冲突,又将国家的现代化远景与英语工具价值绑定。随着全球化时代到来,英语转化为国际竞争力资本,凭借其全球影响力和经济价值,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稳固。

第二,本土语言逐渐转向象征性符号。在英语强势发展的过程中,赞比亚本土语言受限于其自身使用范围,功能逐渐发生转向。2000 年《基础学校课程框架》(The basic school curriculum framework)虽明确强调本土语言具有“使学习者更能欣赏赞比亚的文化和传统”^② 的价值,但其定位已从交流工具转为文化保育层面,折射出本土语言政策工具性的弱化。《赞比亚教育课程框架 2013》在形式上还保留了低年级本土语言作为教学语言的权限,但至《赞比亚教育课程框架 2023》出台时,其应用已被压缩至“辅助英语的解释功能”这一边缘化范畴。由此可以看出,虽然政策文本反复提及促进本土语言发展,赋予其行政、教育等领域地位,但始终缺乏配套的本体规划和地位规划,最终使得本土语言在使用功能上不断弱化,向文化遗产的象征符号转变。

(三) 全球化驱动下的语言战略发展

第一,地缘政治导向的多语布局。在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交织的背景下,赞比亚构建了具有鲜明地缘政治导向的多语教育布局。4 种官方外语的选择映射出国家战略的多维考量。法语和葡萄牙语作为非洲多数国家的前殖民语言,在非洲大陆有着现实的影响力,赞比亚邻国莫桑比克、安哥拉采用葡萄牙语为官方语言,刚果民主共和国(金)以法语为官方语言。中文的法定地位确立,体现出赞比亚对中非合作框架下战略对接的积极回应,也凸显语言政策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度嵌合。2023 年,斯瓦希里语被列入赞比亚第四大官方外语。作为非洲大陆使用人口逾 2.3 亿的超民族语言,^③ 邻国坦桑尼亚、肯尼亚的国语、乌干达的官方语言以及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法定民族语言,斯瓦希里语的语言边界与赞比亚的地缘政治空间形成多重交叠。这种语言规划的布局不仅顺应区域一体化进程,更通过语言连通性增强跨境治理能力,使语言成为区域安全与发展共同体建设的基础性工程。

第二,语言资本积累的前置化策略。全球化进程加速语言生态的演进,也加剧了赞比亚语言教育政策的变化。赞比亚采取语言学习策略前置的措施,将英语与本土语言教学提前至幼儿教育阶段,试图构建语言启蒙、认知发展以及文化认同的早期教育链条。这种语言教育的设计说明教育部门将语言能力视为个体参与全球分工的关键素养。赞比亚试图通过幼儿阶段创造沉浸式语言环境,对文化认知进行早期

① UNICEF. The impact of language policy and practice on children's learning in Zambia [EB/OL]. <https://www.unicef.org/esa/sites/unicef.org.esa/files/2018-09/UNICEF-2017-Language-and-Learning-Zambia.pdf>.

② Ministry of Education. The basic school curriculum framework [M]. Lusaka CDC (Mines): Republic of Zambia, 2000.

③ 参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网[EB/OL]. [2023-07-07]. <https://www.unesco.org/en/days/kiswahili-language>.

培养,以此培育既扎根本土又具有全球视野的新一代公民。这种政策本质是一种战略性投资,通过教育阶段的重心前移,希望在全球化竞争中获得语言能力的“先发优势”,为国家人才的可持续发展奠定语言能力基础。

五、对当地中文教育发展的启示

赞比亚中文教育发展历程可划分为3个主要阶段:坦赞铁路时期、华人华侨推动发展时期以及孔子学院引领的体系化建设时期。^①目前,赞比亚中文教育采用“一院多点”的布局,形成以赞比亚大学孔子学院总部为核心、向全国各省份辐射的发展模式。该模式联合赞比亚教育部在全国10个省份10所中学开展试点中文项目。此外,中赞职业技术学院及其下设孔子课堂也积极推行“中文+职业教育”。

虽然中文教育在赞比亚发展迅速,并已成功纳入基础阶段国民教育体系,但在其多变的语言教育政策框架以及多语种激烈竞争的格局下,中文的可持续发展仍面临显著挑战。基于赞比亚语言教育政策的演变特征及最新的语言教育政策导向,中文教育的未来发展可着力从工具属性、战略属性、融合属性等维度寻求突破。

(一) 提升中文的工具属性

首先,在赞比亚语言教育政策转向职业发展导向的背景下,中文教育的工具属性提升需深度对接国家产业发展需求与语言战略布局。2023年,赞比亚教育部取消中等教育阶段学术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划分,全部采用职业发展的培养路径,中学5~6年级的学习者根据职业方向选择语言学习。《赞比亚教育课程框架2023》也指出,希望学习者能全面了解各种职业选择,明确教育体系强化职业技能导向与校企合作协同机制。在此语境下,中文教育应主动融入中赞产能合作框架,构建“语言+产业”的深度融合模式。推动中文教育在基础阶段国民教育体系中由传统语言教学向职业教育领域延伸,通过建立“中文+技能”的定向培养体系,推动中文成为中等教育中一些职业方向的必修课程,将语言能力与产业需求进行刚性绑定,提升中文在中学阶段职业方向中的实用价值。^②中国在赞比亚设立了非洲第一个境外经贸合作区,为当地创造超1万个就业岗位,这已经形成明确的语言技能需求,为职业导向的中文教育提供了实践场域与现实支撑。

其次,从赞比亚语言层级视角来看,中文正处于“英语——本土语言——外语”三级结构中的第三级,面临层级间以及层级内部的双重竞争压力。因此,需强化中文在经贸、技术合作等领域的专业性教学,突出中文在经济、职业、科技等领域中的实用价值,从而在多语竞争格局中构建中文的职场语言优势。

此外,要继续深化产教融合的发展模式。学校、教育机构等应与企业、行业建立常态化合作机制,共同开发符合产业需求的中文教学标准与课程;依托企业真实工作场景进行贴近实际的语言教学,实现语言能力培养与职业技能提升的协同发展。通过这种产教融合的路径,将中文转化为可量化的职业竞争力要素,推动中文教育向经济生产要素功能的实质性拓展,最终实现中文在赞比亚语言教育体系中的工具属性强化与功能层级突破。

(二) 强化中文的战略属性

国家语言战略通常包括内部语言战略和外部语言战略。其中外部语言战略是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推手,其两大支柱是本国语言的国际传播和外国语言学习教育。^③中文作为一门外语,除了其基础的工具属性以外,更需要被赋予战略属性,要积极主动地融入对象国的发展战略之中,成为其发展进程中的赋能要素。在赞比亚多语政策框架下,中文虽已拥有官方外语身份,获得了制度性的认可,但其战略属性尚未充分显现。当前发展仍面临政策执行碎片化、功能层级边缘化等现实困境。结合赞比

① 祖鲁. 赞比亚教育体系视域下的中文教育发展探赜 [J]. 大连大学学报, 2025, (2): 11-17.

② 李瑞林, 李正升, 马可. “中文+职业技能”人才培养模式探究 [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 2023, (6): 21-27.

③ 李鸿飞. 从大国语言战略出发携手构建人类语言共同体 [N]. 中华读书报, 2023-10-25 (18).

亚语言教育政策中本土语言因缺乏有力支撑而功能弱化的历史教训,要真正强化中文在赞比亚的战略属性并实现其可持续发展,必须进行系统性构建,重点从顶层设计、教育体系整合以及资源保障机制 3 个维度协同发力。

首先,需明确中文教育的战略定位。这不仅仅是语言教学的视角,而是将中文能力建设明确视为服务于赞比亚国家发展的关键支撑要素之一。通过日益增强的经贸合作、科技合作,推动赞比亚明确赋予中文教育特定的战略角色与目标,使其与国家优先发展领域,如基础设施建设、矿业、农业、旅游业、数字经济等领域的人才需求紧密对接,避免中文教育在国家发展计划中被模糊化或边缘化。

其次,需设定中文在教育体系中的差异化发展目标。例如,基础教育小学阶段重点在沉浸式语言体验,以此奠定学生中文学习的趣味性和积极性;中学阶段着力推动中文成为学生可选外语中的优先选项,帮助学生建立多语言思维和跨文化交流的能力;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阶段,关注专业领域的中文应用能力培养,推动中文与赞比亚急需发展或具有比较优势的学科深度融合,实现语言能力与专业素养的协同发展,直接服务于产业升级与高素质人才培养。这种分层递进、目标明确的战略设计,既能避免政策象征性表述导致与实施脱节,又能契合赞比亚语言教育体系对不同语言功能层级的差异化需求,确保中文教育的实际效能。

最后,需完善中文教育的资源保障,这也是中文战略属性落地的基础。要深刻吸取赞比亚本土语言因资源配套长期不足而功能弱化的教训,中文教育需建立前瞻性、系统性和可持续性的资源投入与保障体系。在教材开发方面,需突破传统中国文化单向输出模式,摒弃流于表面的本土化形式,要深入赞比亚本土文化元素与现实生活场景,开发真正以赞比亚学生为主体、高度语境化且兼具语言教学功能的本土化教材,切实增强学习动机和本土应用价值。师资队伍建设层面,需解决基础教育阶段中文师资严重短缺的问题,并构建可持续的本土化师资供给体系。为此,需深化并扩大已有的本科层次中文专业联合培养项目,为基础教育定向培养合格的中文教师;同时,积极推动建立硕士层次的中文教育或相关应用型专业,为培养高层次本土师资和教育管理者提供长远支撑。^①

(三) 重视中文的融合属性

在语言教育功利化倾向日益显著的背景下,中文教育的融合属性常因过度强调其工具属性而被忽视。这种融合属性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其一为外语教育政策的人文性,其二为跨文化传播中的双向互动建构。

外语教育政策中的人文性,通常是指需要在教学中明确以大文科乃至文理贯通的知识为基础的大纲为指导,以获取知识而不是训练语言技能为目标。^② 中文教育需突破传统语言技能训练的单一范式,转向以知识体系建构为核心的复合型教学模式。语言教育不仅承担沟通功能,更应作为文化传承、思维培养与知识获取的载体。在赞比亚中文教学实践中,需实现从“语言技能训练”到“知识素养培育”的范式转型。当前中文教材虽已尝试融入人文元素,但存在碎片化、表层化问题,未来需通过系统化课程设计,将人文目标与教学内容和实践环节深度融合,使语言学习成为文化认知与思维拓展的自然过程。

在跨文化互动层面,中文教育应摒弃单向度的文化输出模式,转向构建基于文化共鸣的双向对话。赞比亚作为多民族国家,其 73 个民族的文化多样性与中国 56 个民族的文化生态形成对话基础。可深入挖掘中赞两国在民间艺术、传统习俗、哲学思想等方面的共同之处,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特色资源开发教学素材。通过“用赞比亚语言讲述中国故事”“用中文讲述赞比亚故事”的实践模式,引导学生在语言应用的过程中实现文化交流与互鉴,把中文教育转化为促进文化理解与价值融合的平台。这种双向互动不仅能增强中文教育的本土适应性,更能通过文化共鸣提升语言学习的吸引力,使中文真正成为连接中赞文化的桥梁。

① 董潇逸,贺宏志. 海外中文教育政策的关联因素与多维研究视角 [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 2024, (6): 10-20.

② 沈骑. 全球化 3.0 时代中国外语教育政策的价值困局与定位 [J]. 当代外语研究, 2017, (4): 26-31 + 109.

六、结语

赞比亚语言教育政策的演变, 深刻映射了殖民国家获得独立后在国族认同与国际竞争中对语言的现实选择。从殖民时期英语奠定统治地位, 到独立后不断对本土语言进行政策调适, 其演变逻辑始终围绕语言工具性与文化认同性展开, 最终也服务于国家政权的统治需求。对于中文教育而言, 赞比亚的政策实践揭示了语言传播需超越单一工具理性, 需要在对象国语言生态中发现语言工具属性、战略属性、融合属性之间的平衡点。这种三位一体的政策逻辑既体现了非洲国家对语言治理的自主诉求, 也为中文教育的本土化发展提供了重要参照。

当前中文教育在赞比亚的推进仍面临语言层级边缘化、语言战略定位缺失、本土需求适配不足等挑战, 这不仅制约了中文教育在赞比亚教育体系的深度融入, 也凸显了构建非洲特色中文教育模式的紧迫性。未来中文教育的发展需构建“宏观——中观——微观”联动的推进路径, 宏观层面关注并对接非洲国家战略、推动中文教育助力区域一体化发展, 实现语言传播与国家利益的有机结合; 中观层面聚焦学校如何实践语言教育政策, 探索“中文+职业”融合课程设计满足学校对语言教育的要求; 微观层面调研中文学习者的不同学习需求, 开发具有针对性的学习课程、学习工具等,^① 以此为构建具有非洲特色的中文教育模式提供更具针对性的理论支撑与实践方案。

Implications of Zambia's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y Reform for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Development

LU Siyu, XU Lihua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Culture and Social Development,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Zhejiang, China 321004)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y in Zambia, systematically tracing its historical evolution from the colonial era to the post-independence period. It reveals core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passive adjustments under institutional inertia, the hierarchical restructuring of language functions, and strategically driven responses to globalization.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Zambia's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y consistently seeks a dynamic balance between English hegemony and symbolic multilingualism. While constrained by the path dependency of colonial governance, it responds to the demands of globalization and regional integration through a three-tiered structure: "English core + indigenous languages auxiliary + foreign languages elective." Based on this analysis and the current state of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development in Zambia, the study proposes insights for its advancement across three dimensions: strengthening its instrumental attributes, enhancing its strategic attributes, and deepening its integrative attributes. The aim i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and practical pathways for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Chinese into Zambia's language education system and for Sino-African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exchange.

Key words: Zambia;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strumental attributes; strategic attributes; integrative attributes

(责任编辑: 杨 恬)

① 邓世平, 王雪梅. 语言教育政策研究的融合视角——《澳大利亚高等学校英语以外的语言教育: 政策、规定与国家利益》评介 [J]. 外语教育研究前沿, 2021, (3): 84-87.